

## 文化与软实力

如果说科技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硬实力”，那么，文化显然是“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软实力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思想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目前我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正是为了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力。

然而，要提升我国文化的影响力，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是不够的。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关键，还在于当代文化的建

设。而这需要我们去创造的。当代文化应该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成果，同时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新的文化形态，也是未来可以提升的、具有根本和普遍意义的文化形态。

随着中国的发展，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将与对“硬实力”的需求同样迫切。未来，当全世界的人们更多地倾向于选择中国的电影、音乐、书籍等文化产品，才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吸引力。而只有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真正富有影响力，才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获得了提升。

### 编者按：

当中国硬实力崛起时，软实力应该如何跟进？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应该如何定位？这些问题的答案，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思想恰恰是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久前，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了“中国软实力与文化外交”学术研讨会，本报邀请了部分与会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对文化建设和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参

#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



赵可金

### ■赵可金

从根本上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由内而外的释放过程，既取决于中国文化资源自身的特性，也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软实力的提升。结合两方面的因素，不难发现中国软实力的困境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文化精英化。

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多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被视作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文化与社会地位、财富和名誉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有文化的人被视为是“圣贤”、“贤能”或者“有学问的人”，可以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受超大规模社会紧张的人与资源关系制约，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不愿将文化世俗化、转化为被社会大众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因此，中国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资源变成了一种硬权力，而不是软权力，文化始终走不出少数社会精英的小圈子，没有转化成为具有世界号召力的软实力。

首先，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特殊性与普世性的转换。任何文明都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统一。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与其他文明体系有过三次重要交锋。在汉唐时期，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交锋，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之后，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交汇，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回教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明清之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华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汇，催生了一波波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汇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然而，经过三次文明交融、交汇和交锋，尽管中华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但中华文化始终停留在亚太地区，没有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始终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经典化与世俗化的转化。由于中国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所掌握，在文化品位上

更强调高雅文化，过于追求阳春白雪，中华文化不缺国粹精品，在文化艺术领域可谓经典云集。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缺陷是文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程度比较低，大多数文化学人不愿意主动做下里巴人式的世俗文化，不愿意将文化产品社会化和大众化，普通百姓缺乏应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机会。同时，从对外角度而言，中华文化观是不平等的“华夷秩序”，明确上下亲疏，确立朝拜册封礼仪。一方面要求诸藩贡使来朝表示自己奉天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回礼”，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施以册封，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藩”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

再次，中国文化没有处理好融合性和冲突性的关系。尽管早在《易经》中确立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但中华文化自秦汉以后，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更强调文化的融合性，淡化文化的冲突性关系。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中华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信条，中国文化不喜欢激烈的冲突，喜欢包容，尊崇厚德，缺乏西方文化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因此，中华文化没有主动向世界扩张，更强调内圣外王，重视道德教化，缺乏基督教文明外方传教的“使命感”。中华文化更安于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没有文化扩张的欲望和内在激励，此种安分守己、敬天保民的思想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不仅宋明之后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受到制约，而且在硬实力比拼上也渐趋下风。

#### 第二，文化非杠杆化。

任何文化要想成为更大范围内大众追随的生活方式，均需要具有一系列功能强大的支点和杠杆。以西方文化为例，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文化获得了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社会权力杠杆。通过这些杠杆，西方文化将自身的文化精神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日用而不觉，逐渐转化为不可抗拒的文化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受到欧风美雨的强大冲击并非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软实力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硬实力载体和各种社会性权力杠杆实现的。

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从根本上并非软实力的下降，而是国家硬实力的衰落。西方国家照样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西方的汉学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研究中国的步伐。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无尽的玄妙和魅力。虽然他们极不愿意承认中国比他们先进，却总也不敢公开说中国没有文化，只能说“中国病了”。

同时，相比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始终缺乏有效的社会权力杠杆。中国世俗化的信仰结构决定了缺乏西方宗教革命带来的持续性信仰权威支持，道德化的礼俗社会赋予中华文化以不可计数的伦理信条，这些伦理信条指导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杜赞奇先生所说的“权力文化网络”，但并没有转化成为能够影响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软实力”。

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现代性规划冲击下，中华文化始终没

有获得抗衡西方文化的能力和空间。因此，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缺乏西方文化得天独厚的社会权力杠杆，大大限制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和空间。如何从总体上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杠杆，建立一整套将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将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 第三，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出路。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铸造中国的软实力，需要挺直腰杆，大大方方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依托，顺应时代潮流，掀起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不断为软实力注入崭新的时代精神和世界影响，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同时，要积极探索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体制和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不断开辟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新舞台。具体来说，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出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一是实现文化软着陆。

中华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柔性化的手段，实现刚性的文化软实力目的。特别是要用老百姓喜欢看、喜欢听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中华文化理念，将看上去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刻差异的中华文化理念，用西方民众熟悉的方式和手法传播出去，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因此，各涉外部门要和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特别是要不仅在海外长驻，通过驻外使领馆、使团和其他代表机构，建立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网，也要在国内长腿，要把触角伸向千家万户，遍及社会各界，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强大的公共外交，实现中华文化的软着陆。中国外交要积极开展中华文化在道德伦理领域的资源，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道德感召力，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资源。

#### 二是实现社会软崛起。

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崛起速度非常快，国际社会难免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中国既不能因此而放慢发展速度，畏首畏尾，也不能对于此种顾虑毫不在乎，置之不理。妥协的办法是在硬实力崛起的同时，也要重视软实力的崛起，要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推广取信于人，用心、真心的对话感动世界，让国际社会接受一个强大、繁荣和值得信任的中国。

特别是要重视开发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优势资源，比如中医、中药、饮食、服饰、武术、气功、京剧、戏曲等，这些社会文化资源目前在海外受到推崇，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要善于挖掘这些社会文化中蕴涵的中华文化理念，凝练和提升文化价值观成分，夯实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 三是要实现国家软驱动。

传统上，驱动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力是利益和权力。凡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就做，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就不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光看重国家利益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大国，不仅看重利益，还要看重价值，要讲原则，不唯利是图，要负责任，不文过饰非。要把文化立国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要弘扬传统文化，还要创造新文化，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赖，建设一个文明大国。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 站在道义制高点

### ■张利华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不仅要靠它的硬实力，即物质力量，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更要看它的软实力，即精神文化的力量，包括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

20世纪美国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后之所以持续时间长，直至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与其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和丰富的软实力有密切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硬实力迅速增长。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么，中国的软实力如何呢？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哪些先进的理念和价值观呢？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对世界和平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和谐思想体现于先秦经典《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以及《论语》、《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对这些经典著作蕴涵的和谐理念进行提炼，可以归纳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我认为，中国和谐思想体系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太极哲学和阴阳辩证法；还包括一整套价值体系，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自我身心和谐的价值

观；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和谐的状态及境界。“和谐”一词的英文翻译是 Harmony，意思是“没有冲突和斗争的协调一致”。我认为这样的表达不太符合中文“和谐”的含义，更不能准确地反映“和谐”价值观的含义。中文的和谐词义是：“事物配合得适当和匀称，组合得恰当协调。”如音乐的音调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会产生优美动听的乐曲，调味品配置得恰到好处，会产生美味佳肴。所以，“和谐”的准确含义应当是适宜、恰当，相当于英文中的 appropriate。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合理、妥当、恰如其分。和谐并不否认冲突和斗争，当事物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要面对冲突，用合理、妥当、恰如其分的方法解决问题，当需要斗争的时候，用合理、妥当、恰如其分的方式进行斗争。所以，和谐并不是无冲突、无矛盾、无斗争的协调一致，而是和而不同的协调与平衡。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方向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为指导，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华，吸收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正义、公平等先进价值观。

即将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中国能不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有没有先进的价值体系，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系所强调的和谐、仁义、诚信、包容、自强、厚德、和而不同，将为反对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张利华

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确与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很不相同。譬如，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自由，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和谐，和谐中包含着自由，实现了和谐就实现了自由；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民主，把多党竞争、议会选举作为衡量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准，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民主，但以“民本”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民生”即改善民生为已任来体现民主。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人权、平等，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仁义、诚信、包容、厚德；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竞争和斗争，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注重修身养性、家庭亲情和人间友情。这些价值观对于调解人际关系和缓解社会矛盾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方向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为指导，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华，吸收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正义、公平等先进价值观。

即将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中国能不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有没有先进的价值体系，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系所强调的和谐、仁义、诚信、包容、自强、厚德、和而不同，将为反对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 “天下体系”及其内涵

### ■赵汀阳

近十年来，多国学者对我的“天下体系”理论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讨论。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解释其中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天下是西周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我所说的“天下体系”并非复古，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重构，是面向未来的新制度。

“天下体系”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治方法论，它提供了一个“家—国—天下”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所以具有未来性，就在于它提供了能够容纳全球化问题的世界尺度。相比之下，“个人—团体—国家”的现代政治框架缺乏世界的维度，于是，世界就是一个无主之地，必定形成由国际冲突构成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显然，世界的公地悲剧不可能通过无政府的私有化或武力征服去解决，因此，全球化的理性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和平共享的世界。通常，国际理论总是从现实出发去分析问题，与此相反，我试图以逆向思维去寻找世界的最优可能性，从理想去反推出现实所缺失的制度。

“天下体系”的一个具体目的是改进永久和平理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及其当代升级版的民主和平论，有一个局限性，就是这种和平必须基于各国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相似性，于是，康德和平或民主和平就无法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康德计划无法回答如何对待那些坚持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以及不同制度的其他国家。那些坚持不同价值观和制度的国家似乎就被看做是不合格的国家，被排斥在永久和平的国际社会之外，这等于默许了“军阀重开战”。康德理论对付不了巴以冲突、全球资源危机或全球金融危机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寻找超越国际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否则世界不可能和平。



赵汀阳

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根本失误是对理性的错误理解。现代所理解的理性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而这种个人理性正是无穷冲突的一个根源。一方的最大化追求必定遭到对方的最大化追求的反制，于是，个人理性行为其实是自我挫败行为，总是错过共同的帕累托改进。天下理论所理解的理性是关系理性，就是优先考虑关系安全的最大化，然后再考虑可及利益。我相信这是世界和平的理性条件。

简单地说，“天下体系”的基本精神是使歧视最小化、谋求互相伤害最小化、追求共同发展最大化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天下的制度建构要求：(1)以关系理性去重新定义普遍价值；(2)以兼容的普遍价值为基础去建立世界宪法；(3)世界宪法必须包含人义(human obligations)和人权并重的万民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儒家价值观需更多建树

### ■贝淡宁

中国代表着何种价值，这种价值又如何向海外推广？儒家思想可能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传统，但是有潜力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儒家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在将儒家政治价值观推广到东亚地区以外这个问题上，中国显然还没有太大建树。由于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政治力量，类似的问题将会更加凸显出来。

儒家传统是丰富多样的，但今天的政治儒家们特别为两种核心价值进行辩护：贤能政治与和谐观。让我们逐一讨论这两种观念，看看它们将如何向海外推广。

#### 贤能政治

无论民主的理念可以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崇尚儒家的改革者们所提出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贤能政治观。儒家学者明确指出，任何关心这个世界的政府都必须由道德和政治才能出众的人组成。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鉴定和选拔那些能力超乎寻常的人。或许对儒家政治理想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就是《礼记》中对于“大道”的解释。这种理念被描述成一个世界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天下为公)的时代，并且这些特点直接意味着贤能政治的观念：“选贤与能。”著名的外交政策分析者阎学通建议中国应该学习荀子对于新兴力量的推荐战略。阎学通明确地对现状提出了批评：“现在，中国谋求人才战略仍然主要用于发展企业，尚未应用于提升整个国家。人才仍然被理解成与技术人员相关，而非政治家或者高级官员。”人才是难得的，但他们并不总被选中：“荀子认为有很多人都是德才兼备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会选择他们。”

借鉴历史上的实例，阎学通提出了寻找人才的一些战略。首先，“开放程度要高：从全世界符合道德、才能标准要求的人中选择政府官员，以便提升政府提出合理政策的能力。第二，阎学通认为官员们应该要为他们自己的错误负责。他反对终身的工作保障，因为这增加了官员们变得堕落、懒惰乃至倾向于重复错误的风险。阎学通还支持可以为政策提出专业建议的独立智库机构。

简而言之，中国可以通过采取一个更加贤能化的选拔政府官员和顾问的体制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实力。

#### 和谐社会

和谐的价值是儒家政治伦理的中心。《论语》中君子应该追求“和”而非“同”的著名划分也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和”与“同”的比较起源于《左传》，《左传》非常明确地提及统治者应该对顾问们提出的不同政治观点保持开放的心态。

但是尊重不同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文化的平等尊重。正如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价值观高于其他宗教价值观，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的价值观高于其他政治价值观一样，儒家也相信儒家的价值观高于非儒家的价值观。重视贤能政治、和谐以及像礼这样的其他儒家价值观的社会要高于不重视这些价值观的社会。早期儒家思想家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同类型的国家，但是他们以文化发展水平为基础，在民族之间进行了划分。划分方式是基于儒家文化，而非种族或者领土。“中国”这一形式指的是受儒家文化约束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原则上它对任何分享那些形式的人都是开放的，无论门第或者种族。那些不分享儒家文化的人被认为是“蛮夷”，但是原则上每个人都是可以“文明化”的。



贝淡宁

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儒家式的中国意味着以对儒家价值的承认为核心来建立国家特性。英语世界中杰出的儒家学者杜维明甚至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被成功发扬之前，必须先在中国以外扎根：“在20世纪(余下的时期)儒家是否能充满活力，将主要看其是否能通过纽约、巴黎、东京重返中国。它一定会面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即工业东亚)的挑战，另外再播种并将种子扎根到这些文化里。”

儒家学者主张使用“软实力”——道德楷模、礼仪、说教——来将“非儒家”的国家纳入其中。天下的观念暗示中国不应该仅仅关注国内和临近地区的文化，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将其政治价值观发扬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